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三〇期 ——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2e)

【史海钩沉】	文革时代北大血与火的记忆	余 杰
【以史为鉴】	敦促胡锦涛给文革结案，惩处反人类罪犯	王容芬
【拒绝遗忘】	“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	冉云飞
【研究报告】	《朝霞》杂志研究	谢 泳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

【史海钩沉】

文革时代北大血与火的记忆

• 余 杰 •

文革时期肆虐北大的暴力与死亡事件，是北大历史中一个永远的伤疤。如今，人们已经不愿或仍然不敢去触及它。即便在一九九七年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有关北大历史的各种叙述中，这段历史都被有意地抹煞掉了。北大低年级的新生们，几乎对昔日北大在文革所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导篡改历史的政治集团取得了某种“阶段性”的成功。

为什么要掩盖历史呢？因为许多身负罪孽的人正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他们沾血的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他们重新成为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名流，重新掌握了叙述历史的权力。作为文革重灾区的北大，差不多所有六十岁以上的老北大人也都与之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受害者和害人者如今和平共处了。如果处处都是有罪的人，那么罪孽也就无法得以彰显出来。

年轻的一代学子，有谁能料到美丽的湖光塔影之间，当年曾经充满血雨腥风，人不人、鬼不鬼？

年轻的一代学子，有谁知道自己的学生宿舍，曾经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红卫兵们刀剑相加的战场？

年轻的一代学子，有谁能料到那些自己无比尊重的、学富五车的老先生，当年犯下过若干严重的罪行？

没有多少人愿意着力呈现这段历史，没有多少人愿意就自身的罪恶进行忏悔，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了。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每个人都在激情澎湃地控诉“四人帮”，而那些曾经施加暴力的人却像一股青烟般消失了。

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很少有人提及文革时期的北大这段血迹斑斑的历史。有的年轻博士在课堂上用后现代、后殖民的时髦理论来阐释文革样板戏。更年轻的一代学子更关心超级女声和博客，新东方和公务员考试，他们对逝去的历史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把文革这段历史看成是三皇五帝的传说，看成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他们甚至不相信昔日有学长倒在血泊之中。但是，我们能因此责怪他们吗？

对历史的规避、篡改，是又一次犯罪。这一罪行的恶劣，比起当年的罪行来，并无丝毫的逊色之处。

这无疑是一场悲剧，一场双重的悲剧：产生罪恶与忘却罪恶的悲剧。但悲剧何以发生、何以恰恰在这所学校里发生？

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值得所有老北大人和新北大人深思。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北大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北大人的鲜血曾为自由和民主而流淌。然而，同一所大学，在短短半个多世纪以后，却成为暴力活动与血腥杀戮的重灾区，成为消灭自由和敌视民主的“先锋队”。

在一个社会里，大学理应是思想最为前卫的地方。大学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不和谐性”。自从大学诞生之初，就具备了对社会现实进行强烈反抗的品质。仅就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学的历史而言，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许多大学都有一段时期在动荡不安之中度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趋于稳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中，也曾先后爆发诸多大规模学生运动。在欧美名牌大学的学生运动中，也屡有流血事件发生。但是，恐怕全世界都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流过这么多的血。北大短短一百年的历史，似乎大半都是用鲜血写成的。有的血流得光荣、流得骄傲，有的血却流得冤枉、流得残忍。在文革时代，北大流淌了无数血，北大燃烧了无数的火焰。而且，北大还把血痕向全国各地扩大，直到流淌血的海洋；北大还把火焰向全国蔓延，直到燃烧成火的王国。

毫无疑问，这是北大的耻辱，这是包括北大在内的所有参与文革的大学及大学中的教师和学生共同的耻辱。如果不承认这一耻辱并开始洗刷这一耻辱，它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 血迹、伤痕与忏悔

在我看来，文革是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化溃疡的整体性爆发，它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领袖的心血来潮。直到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在北大贴出，人们这才恐惧地发现，潘多拉魔盒里的魔鬼放出来以后再也装不进去了。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那些血迹，那些灰烬，是无法长久掩盖下去的。在文革结束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对文革中的北大的历史展开观察和研究，理应成为文革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北大便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学生们本来下午要去上课的，这样一来，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越来越多。”据聂元梓回忆，这张大字报是经由康生夫妇首肯之后才张贴出来的。换言之，这是得到了毛泽东的授意。因此，当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本人赶来北大，并对聂进行批评的时候，聂竟然敢于公然顶撞之。如果没有高层撑腰，这种情形在等级森严的党的体系中根本不可能出现。

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张七人大字报，显示毛公开支持大字报的论点。紧接着《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火力之猛烈，上纲上线之高，令大字报起草人也感到“振聋发聩”。

六月十八日，北京大学发生“六·一八”事件。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一些人在三十八楼等处设立了“斗鬼台”，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甚至发生严重侮辱女干部、女教师的流氓行为。

六七月间，学校领导干部戴着高帽子在校园里游街，在学校的会议上挨批斗，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这些官僚是最早的“牛鬼蛇神”。在审讯和批斗期间，他们受到学生不同程度的拘禁，被关进了“牛棚”。

刘少奇派遣的工作组企图控制北大的局面，并对造反者实施类似于“反右”的整肃。但在七月底，毛泽东以阻碍文化大革命为由，命令工作组从学校撤出。毛十分重视北大的一举一动，毛与北大之间具有不解之缘。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之后到北大呆过一段时间，他对被这所学校冷落的命运感到愤懑，此后多次在谈话中发泄此心情。同时，毛泽东也深味这所学校的弱点，现在他该出击了——既要摧毁这所当年曾经蔑视过他的、作为“精神贵族”的大学，也要利用在学界具有崇高地位的北大来打击他本人要想打击的党政势力，这是一箭双雕的谋略。

工作组撤离时，留下出身好的学生作为运动的领袖。原有的党委和行政组织全部瘫痪，学生们发现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各种学生组织开始形成，他们的分歧发展成为互相对抗的红卫兵组织。许多教师和下级干部及职员，也形成了自己的派系，与相应的学生组织结盟。一些知名学者为了保全自己，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红卫兵组织中去，例如著名教授周培源、季羨林等人，在早期的造反活动中都十分活跃。

八月份，批判大会变得更加猛烈了。对校长、党委书记、反动知识分子的批判依然进行，而且在批判的过程中，他们常常遭到殴打。有人向他们扔墨水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侮辱。妇女被强迫跪在洗衣板上数小时，头发被剃光。无节制的暴行一直延续到宣布军队进入学校才算告一个小的段落。这时，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此数字如今仍然秘而不宣。

血迹之中，有的是有形的、看得见的血迹，也有的是无形的、看不见的血迹。这两种血迹都被回避和遮盖了，尤其是后者。这是一个缺乏忏悔传统的民族，自然也就孕育出一所所缺乏忏悔意识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北大人牢牢记得北大的辉煌，但即便在北大内部，也很难见到对自己昔日的罪过进行忏悔的文字。在有关文革时期的北大的回忆录中，他人的苦难变得轻如鸿毛，人们往往喜欢描述自己被迫害的经历，而难于对自己所犯的错与罪反省。相对于战后德国各大学对纳粹时期的各种罪行的甄别、清理，北大的伤疤还远远没有被揭开。

在北大资格最老的教授、语言学家季羨林的新著《牛棚杂忆》中，关于自身的忏悔依然缺席。这本书中，作者不厌其烦地讲述当年如何受红卫兵的折磨和迫害的故事，本人则完完全全

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但是，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季羨林早期曾积极参与文革的诸多活动，在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多次对其他学者和作家毫不留情地“揭批”。这些细节统统都在回忆中消失了。就是这样一本经过自我保护的“记忆筛选”的著作，在九十年代中期，居然获得了读书界的极高评价。这一戏剧性的事实本身，就表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能力停留在一个多么低下的水准上。

另一位参加过“梁效”（谐音“两校”，即由北大、清华两校教师组成的文革写作班子）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则用《毕竟是书生》作为回忆录的名字，他显然想以“书生不懂政治”来为自己当年的选择辩解。作者试图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我仅仅是一介书生，因此我受政客的欺骗是难免的。周一良还在一九九八年第八期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回顾自己的一生包括文革时期的作为。此时，八十六岁高龄的周一良已卧病在床，是通过口述让学生阎步克教授执笔的。这些回忆既有谨慎的自我辩护，也有艰难的心灵反思：“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们之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上当受骗以后觉悟了，感到自己‘毕竟是书生’；红卫兵们也许所受毒害较深，觉悟比较晚。他们一旦觉悟，不是也会认为自己‘毕竟是个毛孩子’吗？”

在这里，周一良将自己与老一辈学者陈寅恪相比较，认为自己以及同代知识分子们，所缺少的正是陈氏身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是的，“毕竟是……”不能被任何人用来作为逃遁的方法。周一良的儿子后来写了一篇长篇回忆文章，对父亲一代人的人生歧路作了更为透彻的反思。独立的思想是怎样丧失的？自由是如何被剥夺的？大学是如何沉沦的？而杀戮又是以怎样的方式上演的？

◇ 一张不完全的死亡名单

文革期间的大量的档案材料仍然处于被封存的状态，我甚至怀疑最关键的部分已经被有关人等授意销毁了。但是，即便从那些最常见的资料入手，我们也可以寻找到部分血迹、揭开部分伤疤。北大百年校庆期间，出版了一本《北京大学记事》，这是一本相对详尽的北大百年的编年史。这本书对那些特殊的历史时段已经作了相当成功的躲避和遮掩，但从这段不完整的历史叙述中，仍能发现北大文革时代的斑斑血迹。

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九年底，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据《北京大学记事》中的不完全统计，在北大非正常死亡的教授、干部、学生和家属就有以下这些：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历史系副主任汪篪教授受批判后，服毒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英语系教授俞大纲因被批斗于二十五日服毒，经抢救无效，于凌晨零点五分去世。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到北大承泽园造反，刺破居民孔海琨的右额，并在走前将老人拴在树上，致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遭批斗，服毒身死。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经济系遭批斗并被剥夺选举权的学生杨爱明自杀身亡。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哲学系教授沈乃彰在家服毒身亡。生前，沈曾被点名批判、抄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中文系六二级学生沈达力自杀。沈生前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学生”。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原井冈山公社成员王建新、新北大公社成员周瑞青在温州参加武斗，被机枪扫中死亡。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进入图书馆翻阅期刊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温死后，造反派头头孙蓬一布

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死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无线电系六二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四十四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地质系六一级学生刘伟，准备回校办理离校手续，在海淀街被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员抓住，关押在四十楼，并于当日下午被武斗队员打死。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生物系教授陈同度服毒去世。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六日，物理系著名教授饶毓泰上吊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八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自杀身亡。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原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一级教授翦伯赞与夫人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

以上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而已。北大在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已成为“不解之谜”，没有一个北大人和历史学家能够回答上来。在上面这张挂一漏万的名单上，有著名教授、各级干部、职工、学生以及师生家属……可以说，除了部分红五类和造反派之外，其他人随时都可能成为遭受灭顶之灾的“敌人”。这些无辜的冤魂，至今仍然游荡在北大的校园里，他们是正面叙述的历史上的“失踪者”。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与北大的若干死亡事件拉开了关系，她辩解说，当时几乎不知道那么多的北大师生被残害或自杀。她还将北大的死亡事件推到了自己失势之后执掌北大权柄的工、军宣队身上：“一九六八年八月工、军宣队进校以后，他们是在北京市革委会及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是在队校内形势完全可以控制的情况下，而且是在他们亲自组织批斗的情况下，造成了多起自杀事件，翦伯赞夫妇就是在这时自杀的。我去参加‘九大’前，周总理和江青找我去谈话，孙蓬一同志跟我讲，你去见总理，你可别光说你自己的事情，你要说说北大的情况，已经逼死了二十四个人了。我跟总理讲北大当时的情况，总理说别着急，很快会派人去的。”聂俨然成了反暴力的先驱。如此叙述，历史遂变成了“罗生门”的故事。

聂在这里提出了某段时期内北大的死亡数字为二十四人，更多的情况则语焉不详。显然，每一个死难者都需要被记忆，北大每一页可怕的历史都需要被彰显。北大学长、文革历史研究专家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指出：“死亡于同一时期中的人们，他们的死亡模式都很一致。比如，死于暴力性‘斗争会’上或者死于‘隔离审查’的‘牛棚’之中。这些死亡模式清楚地和文革的步骤直接相连。他们的死亡不是个别的孤立的案例也不是出于意外，他们是作为文革的特定部署的打击对象而被杀害的。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挑选杀戮的对象，其标准除了其后天的思想、言论、文字之外，其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也是重要因素。大部分北大教职员和学生都因此而遭到虐待甚至杀害。在此意义上，他们死于一场精心策划的、在国家权力机器的默许和鼓励之下的“谋杀”。这种谋杀完全可以同纳粹集中营的屠杀相提并论。

大部分杀人者并未受到法律的惩罚，文革本来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文革结束之后，被绳之以法的只是少数人。当然，更不用说那些参与暴力活动的人士了，他们大都逍遥法外。八十年代的当政者曾经试图调动党政部门的力量，列出一份文革期间施暴者的名单，但最终未能成功。后来，若干施暴者，如文革早期的联动分子，再次升迁获得高位。他们成为文革真相得以公布的巨大障碍。

如果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反思，在文革这场暴风骤雨的政治运动中，某人是否真正出手打过人，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指标。当年清华附中的学生、自称“红卫兵”这个词的发明者的张承志，后来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他就死死咬住自己并没有亲自动手打过人，因此拒绝向任何人忏

悔，并且张扬当年理想的纯洁性。实际上，打人只是一种具体的形式，比这种具体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场惨绝人寰的运动中，“我”的精神世界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许多人确实没有动手打人，但在思想上、在精神上却参与了“打人”的活动，比如对打人的行为表示认同或默许，比如为打人的行为制造舆论上的支持。这是更深层次的“打人”，例如康生就没有亲自打过人，但他比某一在武斗前线杀人的凶手更加可怕。这些人同样是“打手”——是思想、文化和精神的打手。在文革中，许多人充当了这种“隐形打手”的角色，运动刚一结束，他们便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在新时代里夺取新资源。

◇ 北大的“武斗”

上面是北大在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再来看看北大残酷的批斗及武斗的情况。北大的武斗虽然不是全国各单位中最厉害的，其规模和惨烈程度不仅比不上后来武汉、重庆、成都等地的武斗，也比不上清华的武斗。但是，北大的武斗对于全国来说却有一种表率的作用。一旦作为最高学府的北大亦陷入武斗的泥沼，那么其他地方的武斗自然就会蜂拥而起。北大的批斗和武斗，有如下这些大事：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七日，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从六月初以来，各系各单位揪斗干部、教师的行为逐步升级，戴高帽子、挂黑牌、揪头发、坐喷气式、毒打、往身上贴大字报等情况日益加剧。截至今日，被乱打的干部、教师、学生一百七十八人，其中有“黑帮”分子四十五人，有错误缺点的一百二十人，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七人，好人六人。（该报告对“坏人”、“好人”的分类值得深思。）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校文革筹委会发布《十条建议》，提出批斗干部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校级斗与系级斗结合；斗争会与攻心会结合；大、中、小斗争会结合。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五日，据校文革不完全统计，全校已成立各类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战斗组约九十二个，参加者约三千余人。红卫兵在校内外“横扫四旧”，这期间，校内被抄家者有五百三十六户。临湖轩被改名为“解放院”，燕南园被改名为“反修园”，俄语系也一度被改名为“反修系”。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聂元梓同清华大学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举行成立大会。会上宣布，要把北京市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并表示“要进行巴黎公社式的夺权。”

一九六七年四月四日，校文革召开“彻底批倒刘少奇、邓小平”的万人誓师大会。陆定一、周扬、蒋南翔、吴子牧、宋硕、陆平、彭佩云、翦伯赞、冯友兰、朱光潜等被揪上台批斗，坐喷气式。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校文革召开万人誓师大会，孙蓬一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对逆流”，“目前的这场斗争，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江山落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我们的口号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土必夺，寸土必争。”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校文革和外校十八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万人大会，揪斗王光英。李维汉、徐冰、陆平、彭佩云等被揪上台陪斗。孙蓬一发言说：“血债要用血来还”，“今天，是我们向刘少奇、王光英讨还血债的时候了。”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聂元梓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数学系学生杨建铎任队长，生物系学生师春生为副队长。该兵团携“康生办公室”介绍信到全国二十多个城市查阅敌伪档案，提审在押犯人，凭犯人的口供，搜集编造了老干部的材料，制造了十多起大案、冤案，其中有所谓的“百人专案”。该战斗队逐步达到一百二十五人。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校文革在校内五四广场召开有全市五百多个单位参加的十万人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控诉他们在“北大社教运动中的罪行”。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宋硕、陆平、彭佩云等被揪上台坐喷气式陪斗。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北大造反派头子高云鹏在汉中六五三分校参与汉中地区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支持抄砸当地公安处，插手武斗。于是，发生了炸毁汉中运输公司大楼的“八·一九”事件，造成二十九人死亡，三十余人受伤。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新北大“调查组”在东北四平参加了抢武器库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打伤、打死五十七人。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凌晨一时，北大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武斗持续五个多小时，双方一百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三十六楼，双方发生第二次大武斗。这次武斗造成两百多人受伤。此后，聂元梓、孙蓬一、高云鹏等又下令攻占了二十五、二十七、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等楼群，形成了对占据二十八、三十七、三十六等楼群的井冈山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以宫政香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断水、断粮、断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其打垮。

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下令成立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个专案组，研究抓这三个组织中的“反动小集团”。专案组先后抓捕颜昌忠、韩琴英、徐运朴等十余名师生，进行演刑审讯和逼供，孕妇韩琴英被打流产。

一九六八年四月，校文革将一百三十名干部集中成立“劳改大队”，送到昌平太平庄关押、劳动。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新北大》发表评论员文章，说：“谁反对江青就叫他人头落地”，“牛辉林攻击江青，必须坚决镇压”。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校文革决定在校内民主楼后面的平房建立监改大院。监改大院先后关押各级干部、知名学者及师生两百一十八名。监改大院设有监管人员二十多名，由国政系学生刘国政任总负责人。不少监管人员打人成性，院内气氛阴风惨惨。

一九六八年五月底，专案组负责派人将邓朴方、邓楠绑架回北大，关押了三个多月，逼他们交待“邓小平是如何反对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邓朴方被逼跳楼，高位截瘫，终身残疾。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北京运输三场给困守在二十八楼的井冈山兵团人员送菜，高云鹏令武斗队员从东西两面包抄，双方发生一场武斗，砸坏了汽车，打伤了三场司机。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校文革在四十四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处及井冈山兵团在二十八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两大派系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用长矛互相冲刺，并扔了许多自制的燃烧瓶，武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造成双方许多群众伤残。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军队进驻北大后，新北大公社开始向宣传队上缴武斗工具。据校文革《情况简报》统计，有扎枪、长矛九百三十支，安全帽五百一十八顶，护身甲三百三十六件，铁棍两百根。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晨，井冈山兵团交出的武器，计有：长矛七百四十九支，铁棍七十一根，护身甲两百零八件，柳条帽四百三十二顶，弹弓八个，小口径子弹三十七枚。至此，北大的武斗才告一个段落。

综合而言，北大的武斗大部分局限于校内不同派别之间，少数有校外其他单位和团体介入。基本上还是处于“冷兵器”作战的状态，尚未动用大量重型枪炮。

◇ 对聂元梓的个案研究

研究文革时期的北大历史，聂元梓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聂在文革初期便有“老佛爷”之

称。“老佛爷”的名号来自于慈禧太后，在晚清政坛上慈禧太后堪称说一不二的铁腕人物，其政治手腕之巧妙，斗争方式之残酷，无人能及。聂元梓有此雅号，可见其在北大的所作所为究竟如何了。

聂元梓根本不是北大“嫡系”出身，她是一名“三八式”（即一九三八年入党）的老党员，早年在中共北方局情报局工作，一九四五年出任哈尔滨郑家屯区委书记、市委机关党委书记等职，一九六零年调入北大，先后任经济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等职务。

聂元梓并未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也从未涉足学术和教育领域，但她拥有延安干部的“老资格”，在人民大学和中央党校受过短期培训，因此有关方面认为这样的老干部应当“充实”到北大去。聂最初在北大经济系担任副主任，职权却远在主任陈岱孙之上，聂在回忆录中说：“陈岱孙是党外人士，我们党那时候对党外人士是表面尊重，信任不足，不给人家实际工作做，我在系里做的就多一些，一方面准备兼一些课，一方面做行政工作。”寥寥数语，说出了六十年代初北大的真相：昔日一流的学者们因为“政治忠诚度”的问题，已经纷纷靠边站了。北大的学术传统也正在被斩断，蒙昧主义和政治决定一切的思潮开始在北大占据主流。

文革肇始，聂元梓由一张大字报一举成名，由一个系的负责人（且受到党委书记陆平压制）而一跃成为北大的最高掌权者。聂在北大实际掌权的时间不足两年，却给北大带来巨大的伤害，其罪行罄竹难书。聂在回忆录中竭尽全力降低自己的罪恶：“我投身文革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清除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没有什么个人野心，没有什么权力欲望……我因为觉醒得早，因此遭受的打击迫害多，江青、陈伯达都曾经严厉地斥责我，谢富治等就更不用说了。从工、军宣队进校到粉碎‘四人帮’，我长期地处于监禁和管制之中，吃了多少苦头！”她始终认为自己在文革之后被正式逮捕判刑是“冤案”。但是，那些在文革初期死于造反派暴力之下的北大师生，是否会因此而原谅她呢？

周一良在回忆录《毕竟是书生》中，详细描写了自己得罪聂元梓的下场。周一良颇有政治热情，文革初期便积极参与校内的派系斗争，他选择参加了“井冈山”组织，而“井冈山”与聂元梓所领导的“新北大公社”是两个势不两立的造反派组织。周一良还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静坐示威。“这一下惹恼了‘老佛爷’，我由无足轻重的靠边站，变成了她的死敌，招来了一系列灾难，定要把我弄臭而后已。”

一九六七年秋天，一个萧瑟的夜晚，“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来周一良家抄家，将全家人关进厕所，包括周一良有一条腿残疾的岳母。红卫兵翻箱倒柜，大事搜索，抄家过程中周的次子恰巧回家，被红卫兵逼到墙角树下，痛打一顿。

周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批斗会，是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周与另一反聂的老教授侯仁之同台，还“荣幸”地有北大原党委书记陆平来陪斗。“红卫兵揪住我把头往墙上撞，反复多次，撞得我两眼冒金星，天旋地转，踉踉跄跄站立不稳。当时心想，恰似打斗电影中挨打角色的狼狈相，没料到自己年逾知命还亲身体验这般滋味。”

当最高统治者利用学生造反派打倒彭真、刘少奇等党内“走资派”之后，聂元梓等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便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两点多钟，毛紧急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关于聂元梓和北大的文革现状，毛在谈话中海阔天空地说：“事情要留点余地，都是学生，你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搞了十几个，就那么一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就是因为关键两派忙于武斗。”毛又说：“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点。北大井冈山有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毛

还说：“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的神通，调起兵来只调两三百，你的兵跑哪去了？还得靠工人，复员军人为主力，没有那个你还是不行。叫林彪同志给你几千几万，可以把井冈山统统灭掉嘛！”这一席讲话已然决定了红卫兵领袖们被抛弃的命运。

当工、军宣传队进驻北大以后，聂元梓被迫靠边站，失去了昔日熏天的权势。《北京大学记事》记载：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聂元梓在全校“三忠于”讲用会上被迫承认，自己有“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等问题，说：“我利用职权，批准制造土枪、土炮、土手榴弹、土坦克，甚至断电、断粮，往二十八楼里灌水……还任意抓人、审讯、搞逼供信，打死人”。聂元梓还承认掌权期间，“在校文革中搞小圈圈，排斥异己，搞地下常委……来维护一派的利益，校文革变成了派文革。”在后来揭露的校文革搞的逼供信的事例中，如“把樊某抓去，将十个手指，十个脚趾都用钢针挑起来，膝盖骨上钉钉子，胳膊、小腿都打断了，造成了残废。硬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然而，这一切后来在聂的回忆录找不到蛛丝马迹。

随着形势的发展，聂元梓从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变成人人唾弃的人物。在一九六九年年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聂被定位为“反革命分子、野心家、阴谋家”。北大的《内部通讯》刊登了《权迷心窍的野心家》等揭露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反军”、“夺权”、“武斗”、“杀人”等问题的文章。一九七一年二月，北大召开大会，揭发、批判聂元梓反军乱军问题以及反对“五七”指示的问题。各系也相继开展了大揭发、大批判和控诉、声讨。宣传队领导小组、校革委会决定并宣布对聂元梓进行隔离审查。

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在该年五月的北大第六次党代会上，哲学系代表李中华、政工组代表郭宗林做了揭发、批判聂元梓的发言。揭发聂元梓的主要问题有：分裂群众组织，破坏革命大联合，挑动武斗，镇压群众运动；疯狂反军乱军；分裂党中央，阴谋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以及她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权欲狂”等。北大党委书记杨德中在会上说：“聂元梓还要闹的，此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要继续审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北大的文革史上，聪明一世的聂元梓也成了一枚棋子：她曾经逼人家承认反对毛主席，人家也如法炮制，逼她承认自己反毛主席，这正应了“作茧自缚”这个成语。

聂元梓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这也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出版自由。聂的回忆录重点讲述个人的革命历史，以及在狱中受到的种种虐待。聂认为自己被判重刑，是因为邓小平痛惜儿子邓朴方在北大被逼跳楼终生残疾，亦是因为当时复出负责司法工作的彭真的泄愤。聂还为自己出狱后的生活叫屈，并向胡温上书，但不可能获得任何回应。

聂在回忆录中仍然宣称自己忠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文革在她心目中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和挫折。对于北大来说，文革是北大的溃疡，是北大血液中“官学”传统的一次痉挛式的发作。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北大，以学问和教育为最高人生追求的“老北大”教职员工的边缘化，以政治运动及阶级斗争为喜好的“新北大”的政工干部的得势，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仇恨知识、敌视文化和泛政治化的氛围笼罩整个北大，最后北大被毛泽东选择作为文革的摇篮，乃是首当其冲。而聂元梓正是此过程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范本。

◇ 洪子诚的反思：我们都是“打手”

谁才是真正的无辜者呢，或者我们都是“打手”？北大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中文系学生刊物《启明星》的百年校庆纪念特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点往事》的回忆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在北大人的回忆文章中读到的，最真诚、最朴实、最深刻地直面当年罪孽的文章。它挖掘到了没有血迹的罪孽，是对北大传统的重新梳理和重新认识，也是对自我灵魂的没有退路的质问和反省。

洪子诚那时是一名年轻教师。一九六六年六月，学生来找洪子诚，让他去开会，没有想到是一次批判会。这突如其来的批判，使他陷于慌乱之中，脑子一片空白。学生说：“洪子诚你要仔细听大家的发言，老老实实检查自己。”学生们揭发说，第一、他这名班主任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第二、他重用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犯了“阶级路线的错误”。

一个同学揭露他在课堂上放毒，说到激动处，放声大哭起来。“你不让我们写游行时见到毛主席，是什么居心？！我们革命干部、贫下中农子女最热爱伟大领袖，我们最盼望、最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见到他老人家，你却不让我们写……”这个学生哽咽着，无法再说下去。这真诚、发自肺腑的控诉，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有人便领着呼起“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原来，洪子诚在评讲写作的时候，曾经说到写国庆游行的例子，说每个人的发现都是不同的，不要千篇一律地写准备、出发，写见到毛主席，最后回到学校……没有想到这就是“对毛主席有不满”。

一年以后，洪子诚被下放到干校劳动。临行前，他把一些日记烧毁了。在此过程中，他重读当年的日记，发现其中记载了自己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也曾扮演过“批判者”的角色。一九五八年，北大正在进行“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中文系受到冲击的是王力、高名凯、林庚、游国恩、吴组缃、王瑶等知名教授。

那时，洪子诚正在上二年级，他们班承担了批判王瑶先生的任务。他们找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讲话》，用这个武器对王先生的学术研究进行批判，把王先生的文章定义为“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写出了锋芒毕露的长文《文艺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创作”。

临近毕业的时候，洪子诚去听王瑶先生讲课。先生在不久前刚刚批判过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地陈述个人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具有王瑶特色的爽朗的笑声。课后，王瑶先生又耐心回答学生的提问。洪子诚教授感叹说：“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该走的路。……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王先生道歉过，承认我们当时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我们的反省。”

反右已经为文革打下了基础。北大学风的毒化早已在慢慢蔓延。洪子诚意识到，自己当年对王瑶先生的批判与文革时期学生对自己的批判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在历史长河中，自己并不完全是无辜者和受害者：“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放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在一九四九年之后，一次接一次的政治运动，其模式总是一批自以为纯洁的人去侮辱另一批被视为“不洁”的人。“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角色转变，瞬间便可以完成。此时此刻的“被批判者”，有没有责任为昔日自己作为“批判者”的所作所为而忏悔呢？

断裂在北大已经发生了。作为五四传人、作为西南联大的学子，王瑶为后辈学人树立了崇高、几乎不可复制的榜样，以之为起点，洪子诚追问道：“在王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的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八十年代，朱光潜、宗白华、吴组湘、王力、王瑶这一代大师完成了天鹅的绝唱。那是在文革的废墟之上的惊鸿一瞥。他们力图恢复蔡元培时代北大的精神本源，却未能如愿。文革对北大的伤害太大了，大得超过所有人的想象，迄今为止，这种伤害仍然像艾滋病病毒一样无法从北大的血液中得以根除。换言之，它亦成为北大传统的无法回避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中国，这就是我曾经求学的北大。如何去伪存真，如何驱恶存善，如何在这文革暴发四十周年的日子里为文革“立此存照”，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洪子诚教授在文章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对于已经走过一百年的路的北大，我们每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记那样。”

这是含着血泪的祝福。在毛泽东心中，北大仅仅是一个可资利用的棋子；但在文革十年的历史中，北大确实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负面角色。文革时代的政治风云给当代北大的走向打下了深刻烙印，也成为北大历史传统中最具争议却最“鲜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曾经的北大人，我认为：反思文革，应当从反思文革期间的北大开始，这是一个重要的横断面。

昔日，鲁迅在总结北大校格的时候曾说过：“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松懈。……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今天，北大不仅需要与外部的黑暗势力抗战，更需要与自身的黑暗势力抗战——那就是文革沉重的遗产。只有直面北大传统中的不健康因素、直面北大历史深处的血痕，北大才能走上一条真正的“现代大学”之路。

在文革开始四十周年的时刻，在北大迈进新纪元的起点上，我们依然需要这样的抗战。这样的“抗战”其实才刚刚开始。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改定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 【以史为鉴】

敦促胡锦涛给文革结案，惩处反人类罪犯

• 王容芬 •

（编者按：四十一年前，大学生王容芬上书毛泽东，谴责刚刚出笼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在信发出后以自杀明志，未果，被关押十三年。（见本刊 zk0703d 傅国涌：“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今天，暮年的王容芬致函同代人胡锦涛，要求中国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给文革结案；不了了之，后患无穷。）

尊敬的胡锦涛先生：

拜读《求是》杂志近期大作《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联想到近年大反其道的

咄咄怪事，贸然写信，敬祈明察。

先生坦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将其视为启动改革的内因，重新回到30年前贵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在贵党冰封文革，钳制言论的今天，实属难能可贵。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遗憾的是，30年间贵党在政治改革道路上踟蹰不前，近两年径直大开倒车，返回上一世纪60年代以暴治民的反人类立场。2006文革40周年之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阎王殿如临大敌，禁言文革，禁文、禁书、禁人；反之，却兴师动众纪念毛泽东逝世30周年，铺天盖地为文革祸首歌功颂德，把文化舆论拉回红太阳的中世纪，至今不肯松动。更有甚者，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庆，给当年红卫兵头领宋彬彬颁发“知名校友”奖状，表彰其“在1966年8月18日，主席接见红卫兵时，为主席佩戴上红袖章。”在毛泽东31年忌日，该校又举行盛大活动，树大型广告板，展出宋彬彬为戎装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

值得注意的是，校庆怪事发生在先生教师节讲话一周之后。先生提倡“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教育部的实验学校却宣扬暴力，以施暴力为德，以打死人为荣。这不仅是对先生教师节讲话的蔑视，也是对人类公德的挑衅。一个中学校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央视首席新闻播音员主持，请来外国使节和各界名人近6000人，俨然国家庆典，可谓登峰造极的文革复辟尝试。这场校庆的前台演员袁爱俊校长，文革开始时年仅10岁，却有如此深的红卫兵情结，处心积虑给当年红卫兵头头打上“知名校友”光环，给不知红卫兵为何物的在校中学生树立一个鲜活的楷模。这位教育工作者的荣辱观和育人理念充分体现在“光荣与梦想”的校庆主题里，这场旷日持久的校庆秀不愧为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课。

先生亲历文革，那时在清华待分配，自然知道8.18戎装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意义和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影响。此后宋彬彬更名“宋要武”，全国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北师大女附中改称“红色要武中学”。据当时北京新市委统计，从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市有1772位有名有姓的校长、老师和市民在红卫兵的钉头皮带下丧生。先生所在的清华大学也未能幸免，先生想必记得8月24日清华园里的红色恐怖。漠视当年暴君卷土重来，听任昔日打手登台扬威，一旦41年前的人类悲剧重演，不要说改革开放受挫，5000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就彻底毁了！届时贵党何颜以对14亿国人？先生怎样去见列祖列宗？

文革是反人类大劫，其持续之久、危害之广、杀人之多、手段之劣，在人类历史上都属罕见。1980年贵党曾经审判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但没有审判文革反人类罪。贵党穷30年之力，没能否定文革，盖因没有否定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为灵魂的毛泽东暴力思想，没有否定暴君毛泽东，没有否定暴力组织红卫兵。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倒行逆施和教育部的公开挑衅，根源在于贵党没有脱离专制和暴力路线。

文革中毛泽东输出暴力，支持各国毛分子，扶持柬埔寨红色高棉、日本赤军、联邦德国赤军旅等暴力组织，致使恐怖分子在柬埔寨、中东和欧洲等地区大开杀戒，犯下严重反人类罪行。日本赤军和联邦德国赤军旅的罪犯已被所在国绳之以法，残活的红色高棉毛分子也被押上联合国反人类罪法庭。

到今年6月，文革就42年了，这个历史大案该了结了。不了了之，后患无穷。贵党真要促进改革开放，就当以史为鉴，与时俱进，尊重百姓人权，摒弃暴力路线，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设立反人类罪法庭，宣布红卫兵为反人类暴力组织，将文

革罪犯及顶风作案复辟文革的现行反人类罪犯押上法庭，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告慰文革死者，取信于民，建立和谐社会，推进改革开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直言强谏，恳请三思。顺致

崇高敬意

王容芬 2008年1月12日于联邦德国

◇ 附四十一年前的信：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四年级一班学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 原载《观察》网站

~~~~~

【拒绝遗忘】

“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

• 冉云飞 •

这几年，各个大学乃至中小学，为了捞钱争名，不惜变尽法子让大款校友捐款，让所谓的名校友重新在学校的纪念册上“金榜题名”，人为地将校友分成三六九等，搞了许多丑陋的校庆表演。其嫌贫爱富的势利眼作风，严重违背教育应当注重之人格陶育、自由平等的基本理念，败坏了学校在人们心中应有之受人尊敬的地位，真是让人齿冷。本来校庆是同学们怀念与回忆自己美好的青春岁月，体验师生们久别重逢后的喜悦，增加毕业学生对母校认同感、归宿感、自豪感的绝佳机会。但在中国，凡是参加过校庆的人，鲜有人没看到过如上所说的丑陋表演的，现在要找一所学校所办的干净的校庆已属难得，所有的学校都加入这种丑陋表演而不以为耻，并在这种丑陋的表演中得意洋洋，且视为莫大的功绩。

你以为现在中国学校的校庆已足够无耻了，但中国现实社会中的无耻远远超过伟大小说家的想像力，让他们卓越的想像力自愧不如。我常说，在中国，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你以大款和所谓有成就的校友为荣，我便以恶名满天下的校友为荣，这样更无耻的学校便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北师大附中在九十年校庆中，自然少不了所有学校校庆都有的丑陋表演，但更绝

的是，他能拿出一个其他学校都没有的绝招，以便让北师大附中遗臭万年——在没有做人底线和道德失范的人眼中，遗臭万年与流芳百世并无什么不同，因为从时间上看它们刚好相等——以邀光宠。北师大附中这个绝招，就是推出臭名昭著，死不认错，从无一点忏悔意识的宋彬彬。

宋彬彬何许人也？一言以蔽之，一朵“文革恶之花”。没经历过血雨腥风文革的人大概并不知晓，她在文革可谓红遍中国。她不仅开文攻武卫之先河，而且开打死自己所在学校校长老师之先例，更因此“血染的风采”而受到毛泽东于天安门城楼的接见，并钦赐其更名为“宋要武”。至此，其“不爱红装爱武装”之血染的“风采”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红卫兵打砸抢，以及进行派系斗争、人身伤害的楷模。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文革死亡人数的确切数字，现在当然无法弄清，但死亡人数之众多，可谓触目惊心。我们不能说每一件血案都与宋彬彬有关，但宋彬彬如此榜样，所起的教唆作用，是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的。这样血染的模范其在专制国家的普及功能，真是捷如闪电，迅如风雷，榜样之飓风刮过，中国大地一派肃杀血腥之气。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有九十年的历史，也算一所名校，出了这样的“校庆事件”，居然没看到有该校校友出来谴责母校的丑行，实为曾读书于此的北师大附中校友惜。作为你们的校友，林彪女儿林晓霖尚且知晓替父谢罪，但居然没有人起来抗议学校这样的丑行，殊令人不解。更加可气的是，在所出的北师大校友名录中，将宋彬彬与她带领一帮人折磨至死的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放在一起。我要是卞家的家属，要提出严重的抗议；我要是北师大附中的校友，要写公开信对此提出强烈的批评。同时北师大附中当局在考量此事时，连尊重自己惨死的前同事卞仲耘老师的一点意愿都没有，这不仅不符人情之常，而且有纵容包庇邪恶之嫌。要是哪天“宋彬彬”们东山再起，惨死于他们棍棒刀枪之下的可能就是你。到时，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罪有应得”呢？这便是你树立宋彬彬这样的血染的模范，直接可能加诸己身的悲惨后果。如谓不信，我们拭目以待。

宋彬彬八十年代移居美国，拿到了博士，做出了些科研成就，这些理当肯定。但像宋彬彬这样自称捍卫毛泽东思想最烈，高喊共产主义口号入云霄的人，却知道急早到民主国家去捞取好处，这样的选择当然与其一贯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一脉相承，并不让人吃惊。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宋彬彬却在自已提供给母校的简介中装出一副干净的样子，只从1968年写起，完全抹杀其所造成的血腥之罪恶。如此一来，她使用托马斯全旋加三百六十度转体，金蝉脱壳，立马变成了受人尊敬的知名校友。一个人犯错当然应该受到批评谴责，但犯了错死不认错，从无半点忏悔的表示，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度成为受人追捧的榜样。我们可以承认宋彬彬在某些方面的成就，但我们必须让更多的人知晓她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否则难保北师大附中以及中国的其他学校，不再培养出像宋彬彬这样臭名昭著的“血染的模范”。宋彬彬若想重新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与原谅，除了公开忏悔、承认事实并且道歉以外，别无他途。自己身居民主自由的美国，享尽自由民主的好处，却想继续把自己装扮得干净体面，愚弄母国民众乃至反对母国推行民主自由的海外中国人，包括像宋彬彬这样的“文革恶之花”，不知尚有多少？研究文革及中国诸多灾难的学人，应该有义务向人们公布这一切真相。

2007年12月3日于成都急就

~~~~~

## 【研究报告】

《朝霞》杂志研究

• 谢 泳 •

## 一、《朝霞》杂志研究状况

一切发生过的历史，无论当时或后人如何评价，这些历史本身都具有研究价值。本文研究的是一本文革时期的文学杂志，重新研究这本杂志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对文革时期一本文学杂志的分析和评价，深入认识中国知识份子在一定历史时期，他们在价值和现实处境中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清理这本文学杂志的历史时，从中发现它和中国1976年以后文学现状的关系，特别是在1976年后成名或者长期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主力作家中，许多人的文学生涯都开始于这本杂志，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1976年以后的文学源头，其实是从这本文学杂志开始的。

这本文学杂志就是广为人知的《朝霞》杂志。

目前关于《朝霞》的系统研究还没有，在众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著作中，虽然在叙述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时，会偶然提到《朝霞》，但基本是否定性评价。（1）这对于全面了解文革时期文学和作家活动情况，显然是不够的。王尧认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自己当年阅读《朝霞》时的情景。我自己关于文学的许多观念就萌芽在这种阅读之中，虽然我此后不断校正和抛弃‘许多观念’中的种种，但其影响挥之不去。这常常提醒我：‘文革’和‘文革文学’曾经是我和我们成长的思想文化资源；历史的残酷在于它开了个玩笑，一个曾经是‘正面’的资源终于成了‘负面’。”（2）文革时期阅读这本杂志的人相当广泛，高华回忆自己的学术经历时提到：“在70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都看。”（3）

近几年来，《朝霞》杂志常常被人提起，主要因为余秋雨的文革经历，在关于余秋雨文革经历的争论中，《朝霞》杂志依然是以负面出现的刊物。余秋雨自己都认为“《朝霞》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的一本文艺杂志，由写作组的一位陈女士实际主管，倾向极左，质量不高。”（4）

另外一些早年曾是《朝霞》作者的作家如黄蓓佳、贾平凹、钱钢等人，也在回忆自己早年的文学经历中提到《朝霞》杂志，虽然不回避自己的文学经历，但没有正面评价这本文学杂志。许多研究者的评价，基本也是延续政治上对《朝霞》杂志的定性，很少从当时这本杂志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5）

本文作者认为，对存在过的历史做完全简单的否定性评价，对于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并没有帮助，甚至可以误导人们对那一段历史产生先入为主的陈见，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清理《朝霞》杂志的基本历史。

## 二、《朝霞》杂志始末

本文所指的《朝霞》杂志，包括上海文艺丛刊、《朝霞》丛刊和《朝霞》杂志三部分，凡参与过这三项文学工作的人（包括编辑、作者以及美术设计者如陈逸飞等），都被视为《朝霞》作者群。

“上海文艺丛刊”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的一本丛刊。第一辑名为《朝霞》。这个名字来源于这本丛刊中史汉富一篇同名小说。

当时的体例是“丛刊名”取自丛刊中某一篇作品的篇名。从《朝霞》开始，加上随后出版的《金钟长鸣》、《珍泉》、《钢铁洪流》共四本，标明是“上海文艺丛刊”，32开本，当时印数极高。

随后出版的另外八本丛刊，虽然延续了“丛刊名”的编辑体例，但不再标名“上海文艺丛刊”，而是标明为“《朝霞》丛刊”。也就是说，后来人们所谓的“《朝霞》丛刊”，其实包括了四本“上海文艺丛刊”。《珍泉》一书的“征稿启事”中说：〔6〕

“本刊1973年已出《朝霞》、《金钟长鸣》、《钢铁洪流》、《珍泉》四辑。1974年开始，改名为《朝霞》丛刊，仍为不定期出版，主要发表小说、（包括中、短篇小说和长篇选载）以及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等。

从1974年起，还将同时出版《朝霞》月刊，每月廿日出版，是综合性文艺刊物，内容以短篇小说为主，兼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

《上海文艺丛刊》和《朝霞》丛刊，前后共出版了13本，按先后顺序分别是

| 书 名      | 出版时间     |
|----------|----------|
| 《朝霞》     | 1973年5月  |
| 《金钟长鸣》   | 1973年8月  |
| 《钢铁洪流》   | 1973年12月 |
| 《珍泉》     | 1973年12月 |
| 《青春颂》    | 1974年4月  |
| 《碧空万里》   | 1974年10月 |
| 《战地春秋》   | 1975年3月  |
| 《序曲》     | 1975年6月  |
| 《不灭的篝火》  | 1975年8月  |
| 《闪光的工号》  | 1975年12月 |
| 《千秋业》    | 1976年4月  |
| 《火，通红的火》 | 1976年6月  |

需要说明的是，从已有的材料判断，计划中的《朝霞》丛刊还有另外两本，分别是《无产者》和《铁肩谱》，据《朝霞》杂志1976年7月号任轶文章《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一文的注释，《无产者》将于当年九月出版（此文即是《无产者》一书的序言）。而《铁肩谱》一书，《全国总书目》中有记载，但很难见到实物。〔7〕

《朝霞》杂志1974年1月20日出版，16开本。它的出版情况是1974、1975年完整出版，每年12期，年终编有总目。1976年第9期出版后，因为政治发生变化，以后就不再出版，本年的第9期杂志，可以视为停刊，所以完整的《朝霞》杂志共有33本。《朝霞》月刊出版后，《朝霞》丛刊还在出版，其中有些主要作品杂志和丛刊同时发表。

关于《朝霞》杂志的创办，本文作者认为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文艺工作的需要自然延伸出的一项工作，它的编辑方针和编辑实践完全服务和配合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时全国在此前后创办的各种文艺杂志，编辑思想和编辑体例基本相同。

从已知的历史档和相关人士的回忆中，可以认为，《朝霞》的创办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有联系，但不能说它的出现是阴谋。从后来的历史判断，《朝霞》完全是以文艺形式配合和图解当时的政治，但杂志本身并不是阴谋集团，也不是阴谋的产物。徐景贤回忆文革经历，涉及他帮助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完成的几件事中，特别提到《朝霞》杂志创办的事，他说：“在出版方面，重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图书。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主编出版了《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还搞了《外国文艺摘译》等。”〔8〕



当时负责参与创办《朝霞》的施燕平晚年回忆说：（9）

“1974年，上海市决定要出一本书，开头不是书，开头叫丛书，出丛书，就是专门找一些新的工、农、兵作者，反映当前的，出一本书。当时写作组的领导，陈冀德跟萧木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把作家协会还没有完全打倒或者已经打倒了以后解放出来的，把这一批人开了个座谈会，参加的人我记得有涵子、茹志娟、我，还有一个郭卓。

几个人召齐，召齐以后，当时市委写作组提出，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看现在是不是需要办一个刊物，是不是要重新议议，大家都不写了，是不是还应该写东西？我们都表示，办刊物都是很需要的，因为一个国家总要有一点刊物吧？读者也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这批人都不想搞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家都吃了苦头了，都不想搞了。结果呢，这个会散了以后呢，它就决定有两个人出来，要编书。一个是欧阳文彬，一个是我。两个人到出版社，不是属于出版社领导，属于市委写作组直接领导，就是编一本书，编一本丛刊。这个第一期的丛刊叫《朝霞》，每一期的名字不同的，总的叫《文艺丛刊》。第一期的名字叫《朝霞》，第二期换成其他一个名字了。它是这一期上哪篇文章写得比较好的，就用这个题目作为丛刊的书名。实际上是一个刊物。

《文艺丛刊》以后出了大概靠十本，十本左右。每一期的名字不同的。那个丛刊，当时只有两个人，就是我跟欧阳文彬两个人。

当时市委有个写作组，市委写作组下面有文艺组，这个文艺组大致相当于现在市委宣传部的文艺处，文艺组的负责人叫陈冀德。

当时我们没有名义上说谁是主要负责，就是我和欧阳两个人共同负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过渡。到1975年开始正式办月刊，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了。月刊叫什么名字呢？大家想来想去，就叫《朝霞》。所以1975年开始，正式出了《朝霞》。出了《朝霞》以后，欧阳文彬跟我两个人，她是政治上负责，我是业务上负责。当时不叫主编，是编委。这个都是当时写作组决定的，这样子就办了《朝霞》了。

办了《朝霞》以后，到了1975年的10月份，北京呢要办《人民文学》，这就插到《人民文学》了。北京要办《人民文学》呢，他们提出希望上海办《朝霞》的，因为《朝霞》当时是‘四人帮’下面的一个直接的刊物，全国比较有影响，在这个里面找一个比较有经验的人来准备这个《人民文学》复刊。”

施燕平的回忆，虽然个别时间不准确，但大体是当时的基本情况。

《朝霞》创刊时，编者在“致读者”中说：

“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上海同全国各地一样，革命和生产都有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同时，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也正在蓬勃兴起。为了进一步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推动创作队伍的发展，我们决定出版不定期的《上海文艺丛刊》。

现在出版的《丛刊》第一辑，以小说为主，作品绝大多数是工农兵业余作者写的，其中近半数作者还是刚开始写作的新手。是火热的斗争生活激励他们拿起文艺武器，通过革命英雄形象的塑照，努力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风貌，热情歌颂毛主席路线的胜利。

《丛刊》将发表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除小说、散文、？事诗外，还准备发表话剧、电影剧本和报告文学以及文艺评论等。以后也可能出某一种文艺形式的专辑。热切希望得到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的支持。让我们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共同努力学习 and 实践，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争取文艺革命的更大胜利！”（10）

《朝霞》杂志受控于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它的工作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为当时的主流

政治服务。《朝霞》创办前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还创办了几种杂志，如《学习与批判》《自然辩证法》《教育实践》《摘译》等。（11）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几十年后再观察，创办这些杂志比不创办要有益于社会，我们可以否定杂志的内容，但不能否定杂志存在本身，如果完全以政治关系的转换评价历史，那是不客观的。就以《朝霞》杂志的出现来观察，因为有了这本杂志，文学活动提前得以恢复，虽然文学创作本身仍然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但作为文学活动本身，《朝霞》的创办，使部分作家提前回到写作中，特别是随着大学的恢复和工农兵学员的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学活动和相应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使文学训练和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得以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变态的方式展开。特别是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偏重于从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中选拔文学和学术精英，客观上为知识精英的上升提供了条件。

### 三、《朝霞》杂志作者群

《朝霞》杂志的风格，大体上延续了文革前十七年中国文学杂志的基本模式，只不过在贴近现实政治方面更为极端。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评价，这本杂志在文学本体方面提供的意义实在有限，特别是在各种艺术形式的探索以及文学语言的运用上，《朝霞》及其作品基本没有提供什么有创造意义的东西。但在培养文学青年和使文革前就开始写作的作家和学者恢复文字工作上，《朝霞》无疑还有它的作用，也就是说，因为杂志的创办，使新老作家开始恢复写作生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作家能不能重操旧业和新作家能不能实现写作的理想。

在《朝霞》杂志上活跃的主要是文革前成名的工农兵作家，如胡万春、段荃法、张有德、李学鳌、仇学宝等，还有一部分在文革前就比较活跃的作家如李瑛、菡子、任大霖、孙友田等；学者方面主要有刘大杰、郭绍虞、林放、陈旭麓以及更年轻的一些作者如高义龙、陈思和、杜恂诚等。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朝霞》杂志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没有发表过署名文章，文革中最有影响的小说家浩然也没有作品在《朝霞》上发表。从这一点判断，本文作者更倾向于认为，《朝霞》杂志出现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主要原因是相对文革前期，整个社会生活有趋于恢复正常秩序的要求，在正常社会生活中，文学艺术自然会成为人们的追求。

1974年、1975年，当时政治的主导倾向是“以安定团结为好”。（12）在这个倾向下，1975年7月前后，毛泽东和邓小平谈话时曾提到：“样板戏太少，……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13）几乎同时，和江青谈话时也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14）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电影《创业》《海霞》的批示，支持姚雪垠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以及对《鲁迅全集》的出版、《诗刊》复刊等许多批示，都比较有利于恢复文革前中国文学的格局。《朝霞》虽然创刊稍早，但大体上顺应了主流的政治要求，它后来的稳定出版也与当时的形势相关。（15）

在《朝霞》创刊前后，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文学期刊在恢复，如湖南的《湘江文艺》、山西的《汾水》等。（16）在这个意义，把《朝霞》及文革后期恢复和创办的各种刊物，放在常态的行政权力运作中来理解，比较符合实际。至于杂志的内容和风格，不要说文革时期，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各种刊物，大体也是同一个模式。（17）《朝霞》出现后，作为文学活动，它吸引了相当多有志于文学写作的青年，从下面的统计中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1976年后成名的部分中国作家在《朝霞》杂志发表作品情况（只统计真实姓名，笔名

不算在内，如余秋雨用笔名发表的文章不做统计)：

| 作家姓名    | 篇名及体裁             | 发表处及时间         |
|---------|-------------------|----------------|
| 黄蓓佳     | 补考(小说)            | 《朝霞》，1973年     |
| 陆天明     | 扬帆万里(三幕话剧)        | 《珍泉》，1973年     |
|         | 樟树泉(四幕话剧)         | 《青春颂》，1974年    |
|         | 火，通红的火(四幕话剧)      | 《序曲》，1975年     |
| 古华      | 仰天湖传奇(小说)         | 《碧空万里》，1974年   |
| 叶蔚林     | 大草塘(小说)           | 《朝霞》月刊1975年8期  |
| 焦祖尧     | 矿山的春天(电影文学剧本)     | 《千秋业》，1976年    |
| 钱钢      | 钢浇铁铸(小说)          | 《序曲》，1975年     |
|         | 老首长的战友(诗)         | 《朝霞》月刊1974年2期  |
|         | 战士之歌(诗，与杨晓驯合作)    | 《朝霞》月刊1975年6期  |
|         | 扫帚苗(诗)            | 《朝霞》月刊1975年11期 |
|         | 金环岛畅怀(诗，与赵宏元合作)   | 《朝霞》月刊1975年12期 |
|         | 献给十年的诗篇(诗)        | 《朝霞》月刊1976年6期  |
|         | 指路的明灯 继续革命的动力     | 《朝霞》月刊1976年1期  |
| 孙绍振、刘登翰 | 狂飙颂歌(诗)           | 《朝霞》月刊1975年1期  |
|         | 第一线上(诗)           | 《朝霞》月刊1975年11期 |
| 袁和平     | 马背上的教师(剧本)        | 《不灭的篝火》，1975年  |
|         | 边塞新曲(散文)          | 《朝霞》月刊1976年2期  |
| 李小雨     | 长征新曲(诗)           | 《朝霞》月刊1975年11期 |
| 路遥      | 江南春夜(散文)          | 《朝霞》月刊1974年5期  |
| 孙颢      | 长江后浪推前浪(小说)       | 《朝霞》月刊1974年6期  |
|         | 老实人的故事(小说)        | 《朝霞》月刊1975年5期  |
|         | 窗口(报告文学)          | 《朝霞》月刊1975年12期 |
| 贺国甫、黄荣彬 | 工厂的主人(剧本)         | 《朝霞》月刊1974年7期  |
| 王小鹰     | 花开灿烂(散文)          | 《朝霞》月刊1974年10期 |
| 徐刚      | 涛声(诗)             | 《朝霞》月刊1974年5期  |
|         | 县委会上(诗)           | 《朝霞》月刊1974年7期  |
|         | 上海啊，你的未来——理想颂     | 《朝霞》月刊1974年11期 |
|         | 光明颂(散文)           | 《朝霞》月刊1975年2期  |
|         | 追乡音(诗)            | 《朝霞》月刊1975年11期 |
|         | 革命摇篮颂(散文)         | 《朝霞》月刊1976年5期  |
|         | 在历史的火车头上(散文)      |                |
|         | ——献给我们伟大的党        | 《朝霞》月刊1976年7期  |
| 俞天白     | 高空的闪光(散文)         | 《朝霞》月刊1975年2期  |
|         | 爆竹声声(散文，与王锦园合作)   | 《朝霞》月刊1975年7期  |
|         | 第一号档(小说，与王锦园合作)   | 《朝霞》月刊1976年5期  |
| 贾平凹     | 弹弓和南瓜的故事(儿童文学)    | 《朝霞》月刊1975年6期  |
|         | 队委员(小说)           | 《朝霞》月刊1975年12期 |
| 余秋雨     | 记一位县委书记(散文)       | 《朝霞》月刊1975年7期  |
| 罗达成     | 兴业路抒怀(散文)         | 《朝霞》月刊1975年7期  |
|         | 炮火篇(散文)           | 《朝霞》月刊1976年5期  |
|         | 古炮的壮歌(报告文学，吴振标合作) | 《朝霞》月刊1975年12期 |
| 赵丽宏     | 胜利的渡口(散文)         | 《朝霞》月刊1975年7期  |
|         | 笛音缭绕(散文)          | 《朝霞》月刊1975年10期 |

|     |                |                |
|-----|----------------|----------------|
| 李 瑛 | 钻石及其它（诗）       | 《朝霞》月刊1975年4期  |
|     | 向2000进军（诗）     | 《朝霞》月刊1975年11期 |
| 刘绪源 | 女采购员（小说）       | 《朝霞》月刊1975年8期  |
|     | 光明磊落（与蒋明德合作）   | 《朝霞》月刊1976年2期  |
|     | 凌云篇（小说）        | 《朝霞》月刊1976年2期  |
|     | 新生事物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 《朝霞》月刊1976年6期  |
| 夏坚勇 | 掌印（小说）         | 《朝霞》月刊1976年2期  |
| 王周生 | 晨光从这里升起（散文）    | 《朝霞》月刊1976年3期  |
| 杜恂诚 | 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漫谈（评论） | 《朝霞》月刊1976年4期  |
| 陈思和 | 且谈“黄绢之术”（评论）   | 《朝霞》月刊1976年6期  |
| 周 涛 | 送报的姑娘周涛        | 《朝霞》月刊1976年8期  |
| 陆建华 | 录时代风云塑一代新人（评论） | 《朝霞》月刊1976年8期  |

#### 四、简短结论

以《朝霞》杂志作者群为基本观察角度，我们可以发现，1976年以后，随着中国政治关系的转变，《朝霞》作者群的写作方向并没有经过艰难的选择而是自然地转向了适应新的政治要求，尽管此次适应的新政治关系与原来有极大的差异。这个现象说明当时中国知识份子的知识系统和价值取向是以现实利害为唯一选择的，1949年以后形成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基本没有培养起具有独立人格和超越功利目标的知识份子，这个特点决定了1976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品质和深度。

1976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1989年以前），从表面形态上观察与此前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但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个时期活跃的作家其实都与文革写作有密切关系，当时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和语言方面只是以往写作的自然延续，发生变化的是当时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写作形态。（18）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主要发生变化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和作家的评价立场，在文革写作中被否定的人物形象和事件，在1976年以后的写作中由负面简单转向了正面，作家的立场随着政治关系的现实利害选择自然倒向了和现实利害平衡的一面，这就是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作品何以不能令人尊敬的根本原因。因为1976年以后发生变化的只是表面的政治关系，直到今天，1949年以后形成的政治传统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基本的道统没有改变，所以活跃在这个道统之下的中国知识份子，通常以适应现实利益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极少有作家能从内心产生深刻的痛苦和绝望的情绪。

我们可以从余秋雨的经历做一个简单分析。

余秋雨1946年出生，这个年龄决定了他的学校教育是在1970年前完成的。在特殊的年代里，他能在非正常的精英流动中被选拔出来，一则说明他有写作和学术才能，二则证明他是这个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好学生。因为这个教育背景是有问题的，而最能和这个教育背景相合的学生，也就是这种教育制度最理想的学生。

余秋雨是一个有写作才华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在任何时候都有对学术的渴望，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他们可以顺利走上学术道路。然而在余秋雨开始对学术生活具有强烈愿望的时候，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没有正常的学术了。对那些早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痛苦是以后不能再从事学术工作，而对余秋雨这样的青年学术才俊来说，却是他们已没有可能再过真正的学者生活，和老一代学者比较起来，更痛苦的是余秋雨这一代人。他们的文革经历和他的学术经历是重叠的，在那样的时代，对一个想从事写作或者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余秋雨后来的道路是最正常的，也是那一个时代里还对学术存有愿望的人的唯一选择。

余秋雨的青年时代，对他的写作才能只有一种畸形的要求，除非一个人对写作丧失了最后一点愿望，否则他们就很难摆脱那个时代对他们的所有制约，余秋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保留了他的写作才能。在他同时代许多知识份子都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他总是在进行文字工作，从写作训练的角度说，余秋雨比他的同时代人还是先行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年写作组成员，后来多数能在文学或者学术上有所成就的原因。1976年以后，在上海新闻和出版界活跃的许多主要力量（特别是青年一代），基本是早年《朝霞》的作者如江曾培、林伟平、刘绪源、朱金晨、徐开垒、赵兰英等。

在《朝霞》时期，徐刚和钱钢是发表作品最多的两位作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两位当时在《朝霞》杂志社参与了编辑工作，但因为文革的原因，一般不愿意详细提起这一段经历。但这两位作家在1976年以后的中国文学活动中，同样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直到今天也如此。

比起《学习与批判》来（19），《朝霞》作者群在1976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写作中更具有知名度，《学习与批判》作者群中（特别是青年一代作者）1976年后成为中国学术界知名学者的极少，这个事实说明文学写作相对学术研究而言，更容易发生价值和立场的简单转换，很多时候这个转换并不需要思考，观念转换比技术容易，立场转换比价值认同简单。或者说1976年以后的作家更多来自于《朝霞》作者，而学者却较少来自于《学习与批判》，比起《朝霞》杂志注重培养工农兵和知识青年作者来说，《学习与批判》更依赖于当时的写作组成员。

对《朝霞》杂志的研究，可以成为人们理解文革时中国知识份子生存方式的一个角度，不仅是文学，就是其他各类艺术如美术、音乐、电影甚至学术，参与其事的中国知识份子并不在少数，因为知识精英的总量在一定的时期是稳定的，任何政治集团都可能为自己的政治需求从这部分知识精英中选择自己需要的人。对中国知识份子来说，因为现实政治的压力过大，严酷的户籍制度和严密的单位制度导致个人在社会中没有任何退路，所以生存始终是第一位的因素。也就是说，对中国知识份子来说，人生价值以及更为更远的理想极难成为他们人生的坚定目标，在现实利益中飘移，是他们的基本生存形态，所以用“激进”或者“保守”等西方概念来评价中国知识份子，总是稍嫌简单。

2006年3月21日完稿于太原

注释：

1.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1999年，北京。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北京。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上海。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北京。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
2. 王尧《迟到的批判》第2页，大象出版社，2000年，郑州。
3. 高华《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7页。
4. 余秋雨《借我一生》，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第253页。
5. 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想史论——1956—1976》，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6年，第438页。该书认为：“除《学习与批判》外，这个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自然辩证法杂志》等共八个刊物，这些刊物的编辑、审稿全由写作组一手包揽。它和“两校大批判组”南北呼应，几年里在它直接控制下发表的文章有1000多篇，出版书籍几十种”。王家平《文化大革命时期诗歌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该书认为：“文革后期《朝霞》丛刊的创办，是权力集团借助文艺形式灌输自己的政治理念的主要尝试。”

6. 《珍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96页。
7. 董国和《“文革”期间出版的〈朝霞〉双刊》，《旧书信息报》第8期第7版，2005年，石家庄。
8. 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343页。
9. 施燕平口述《我的工作简历》，吴俊等整理，《当代作家评论》第3期第150—151页，2004年，渚阳。
10. 《朝霞》，上海人民出版，1973年，第319页。
11. 魏承思《中国知识份子的沉浮》，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12. 毛泽东当时有两个批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402页。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43页。
14. 同上，第446页。
15. 参阅夏杏珍《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1975年文艺问题述论》，见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张化《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425页。
16. 王尧《迟到的批判》一书中提到1976年后成名的作家中，基本都是这一时期开始写作的如韩少功、陈建功、蒋子龙、成一、张抗抗、湛容、刘亚州、冯骥才等。大象出版社，2000年，郑州。
17. 1957年反右刚开始，当时的《诗刊》杂志就出版了“反右派斗争特辑”，臧克家、袁水拍、田间、郭小川、沙鸥、邹荻帆、徐迟等都写了批判右派的诗歌。见《诗刊》1957年第10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文艺报》1957年1—38期几乎全部是反右派的文章，文艺报社，北京。
18. 参阅历届全国优秀作品获奖名单中获奖作品的题目和作者，可以说早期《朝霞》的重要作者几乎都又出现在这个名单上，无论是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还是话剧，无一例外。
19. 《学习与批判》杂志，1973年9月创刊，1976年10月停刊，共出版38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另外写有《〈学习与批判〉杂志研究》一文。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